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古巴人民社会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要文件

57814

世界知識出版社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古巴人民社会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1960年8月16日至22日)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年·北京·

**古巴人民社会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84 元

1961年12月第一版 196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8·字数180,000

統一书号·3003·597 乙(3)

目 录

关于党的工作的总报告	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 罗加	1
关于党綱的报告 ...	古巴人民社会党全国执行书记 埃斯卡兰特	124
总结发言	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 罗加	148
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175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綱		197

(1960年8月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党的工作的总报告

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 罗加

男女同志们：

我党上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与现在根本不同的情况下举行的。

当时，1952年2月，我们处在一种困难的局势中，处在发生政变与建立暴政统治的前夕，接着而来的是整整一个极端非法状态的时期，充满了无法无天、镇压、非刑拷打、监禁、暗杀、鱼肉人民、向帝国主义者卖身投靠奴颜婢膝的行为，这个时期一直到1959年1月才结束，而现在，我们却处于革命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引下胜利发展着的环境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革命，将不顾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与仆从、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和卖国贼的侵略与威胁而在一切方面迈步前进。

当然，我们不能对这样长的一个时期进行详尽的总结。而且这样做对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来说也不是必要的，因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订出重大的路线来在古巴革命的现阶段过程中引导我们沿着保卫与推进革命的道路前进。

关于上一次代表大会，我只打算提醒一点，就是它是在一次后来没有举行的立宪选举的前夕举行的，因此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

一、通过一个解决我国问题的包含当前迫切要求与治本措

施的政綱。

二、決定縱令在沒有聯盟的情況下也投票贊成古巴人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並應向該黨提出上述政綱，要求它對此表示態度。

3月10日的政變，阻止了這次選舉的舉行，在國內造成了新的局勢。

我們對政變和巴蒂斯塔暴政統治的態度

在全國所有有組織的政黨當中，我黨是第一個譴責與揭露3月10日政變的，這是一件盡人皆知的事實。

在奧連特、卡馬圭和拉斯維利亞斯等省份，我們的組織在3月10日引導了群眾走上街頭，並且積極動員起來進行抵抗，當時地方軍事當局還沒有投靠當時奪取了哥倫比亞軍營的集團。

我們對3月10日軍事政變的譴責與揭露，同其他政黨政派後來所作的譴責與揭露是不同的；我們在譴責與揭露時，指明了美帝國主義者在策劃與指揮政變當中所起的作用，這一點，從與（美國）國務院有聯繫的記者愛德華·湯姆林遜在政變舉行之前一些時候發表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

我們毫不折扣、毫不妥協地譴責了政變和由巴蒂斯塔自己安置的政府，同時又清清楚楚地指明了社會力量（帝國主義、大剝削者、大莊園主等）和那些站到了（這次政變和政府成立的）前列的人們在促成這（政變和政府成立）當中所起的作用。

當時採取這種態度，並不是容易的，因為：

首先，3月10日政變的發生，表面上是為了反對一個雖然在反帝口號下開始政治鬥爭但卻在執政八年當中聲名狼藉的執政集團；這個集團向帝國主義的壓力屈了膝；在以法西斯手法把

穆哈尔及其党羽强加在古巴工人联合会领导机构当中之后，执行了一种分裂、腐蚀与败坏工会运动的政策；它实行了或是纵容了对工会领袖与工会积极分子如卡布雷拉、费尔南德思·罗伊格、阿曼西奥·罗德里格斯、何塞·奥维埃多、阿拉塞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等等以及伟大的糖业工人领袖与我党领导人赫苏斯·梅能德斯的谋杀；它助长并纵容了一些以多少有点革命气味的名义为标榜、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地敲诈凶杀的帮匪集团的风行；它完全非法地查封了“今日报”和“美洲体育报”，把它们的印刷厂封闭了一年之久。占据并侵夺了“1010”广播电台。开始的时候，许多工人被3月10日的政变所迷惑，因为他们以为政变是摆脱那个执行反对他们的粗暴血腥政策的政府的一条捷径。我们党所宣布的坚决反对政变的立场，在一开头的时候同这些工人的迷惑情绪发生抵触。

其次，巴蒂斯塔经过政变而成立的政府，在开头的时候曾经企图最大限度地保持正常的外表，并打算使人们相信它不会实行镇压和采取反对工人、人民、各政党等等的措施。

第三，从1938年年底起实际上到1946年初，党曾经同巴蒂斯塔有过统一战线。在这个过程中，党在经历了十三年的地下生活和严酷镇压之后取得了合法地位（1938年9月）；成立了古巴工人联合会（1939年）；召开与举行了制宪会议（1939—1940年），这次会议在我党有力的、突出的参加之下，通过与颁布了1940年的民主进步宪法；古巴参加了反希特勒联盟与对纳粹—法西斯—日本轴心作战的政策；古巴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保持了一种实现自由与温和进步的政策。这一切曾在某些人民阶层当中造成了某种亲巴蒂斯塔的情绪，甚至在某些落后的党员当中也是如此。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充分的开展，不会很好地估计国内局势与巴蒂斯塔的方向当中所起的变化，而其实巴蒂斯

塔正在轉向反动方面，为了重新上台执政而自告奋勇去充当帝国主义者无条件的臣仆。

党坚决地打破了这一切的障碍，并向受到迷惑的人指出，党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政变和在政变中产生的政府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

党坚定不移地主张，解决古巴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粉碎3月10日建立的、反动的、为帝国主义效忠的、反民族反人民反工人阶级的政权。

我們这种态度，首先是基于政变的明显的反动的和反民族的性质上，这个政变在历史上关闭了在1933年以来开辟的新时期，和实际上在新的条件下恢复了旧政权；同时也基于政变是由美帝国主义者所策动的，他們渴望加速实施特魯斯勞計劃并取得新的殖民主义租让权，这一切使得政变所产生的政府不可避免地选择暴政的方向并使馬查多式的恐怖变本加厉。

我們并没有被政府初时的表面上的容忍态度所迷惑，也没有被那种用浪费战时与战后积蓄起来的外汇来提高公用支出的罪恶手腕而取得的某些经济高涨所迷惑。相反地，我們揭露了这种政策将要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并指出了它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

不出所料，政变的性质与根源、促成政变的力量和为政变所依靠的分子，决定了一开始时表面上的容忍态度一变而成为暴政所特有的罪恶迫害狂。暗杀、非刑拷打、对被捕者的虐待、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武装团体与帮匪集团的肆虐，事实上成了执政与统治的制度。由于政变政权与我国互不相容，并与人民相对立，所以它唯一的权力只是来自暴力、镇压与威胁。

帝国主义、巴蒂斯塔及其走狗，以为他們将能以他們的暗杀和兽行来吓倒古巴人民，但結果却絕非如此。

古巴人民不但沒有被吓倒,反而明白了,为了摆脱恐怖和罪行,唯一的道路只有坚决面对着它,不对它投降,而是大力对它作斗争,像我党一样不倦地在全国与全世界面前揭露它,甚至向最高法庭和联合国致送书信,里面列举了并詳述了暴政的某些恐怖行为。

我們对3月10日产生的政权的反对态度,同其他政党对它的反对态度之間,不同之点在于我們的态度是彻底的、涉及該政权所有各方面的政策。我們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政变的产物才反对它,而且也因为,正如我們所证明的,它是帝国主义者用来加速实现其反对古巴人民的计划的工具,因为它标志着地主和大剝削者恢复了完全的权力,从而恢复了作为执政方法的恐怖、暗杀与非刑,因为它把我国一任貪婪的美国壟断組織摆布,向它們作出新的丧权辱国的让步,因为它准备着我国的一个經濟浩劫,例如不負責任地增加公用支出与靠損公利私而非法致富,因为它在为它充当支柱与代理人的穆哈尔集团的同謀下加深了工会机构的分裂,对它实行法西斯式的国家化,使它腐化、墮落,因为它使古巴的对外政策完全从属于美国政府,甚至从屬到了这样的程度:古巴駐联合国及其他机构的代表仅仅遵奉美国代表的命令,我国沒有同那些不同意美国的国家以及被华盛顿企图以自己罪恶的冷战政策来加以孤立的国家保持外交或貿易关系。

以这种方式来观察对暴政的反对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就強調了一件事實,即問題不在于改換执政的个人,而是要通过人的变换,通过占統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变换,来改变整个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关系(从从屬的关系变成主权的關係)、对一切問題的政策、基本的和根本的方針。

当时有些人认为美国統治者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反对3月10日成立的政府的斗争中,必須取得美国統治者的支持,这

些人把取得華盛頓的贊許或好感作為自己全部政策、一切言行的條件。這就迫使他們贊同巴蒂斯塔的反共反蘇；贊同這個政府的發言人在聯合國發表的挑釁性言論，贊同它所奉行的給予美國壟斷組織、公司與投資者以特權和讓步的政策，贊同穆哈爾集團在古巴工人聯合會中實行的方針，贊同對美洲區域工人組織和美洲國家組織的屈從，贊同拒絕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對民族有利的貿易關係，等等，也就是說，贊同一切違反古巴利益與古巴人民需要的做法。這也就迫使他們——除了還有其他原因之外——把擊敗現政權的目的僅僅局限於往往稱為恢復政制程序的範圍之內。

有些人認為問題要靠建立一個明確中立的政府來解決。

正如我們當時所主張的，這樣一個政府，是一種空想。在政變的支持者——他們掌握着政權，而且不願放棄它——和政變的敵人之間，不可能有一個明確中立的政府。能使古巴擺脫那個危機的政府，就是一個明確反對政變、反對那些策劃了政變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力量的政府。

另外一些人認為有可能把事情引回到8月9日，即政變以前的狀況去。

但是，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這些人之中任何一個人也不認為除了提出更換政府，成立中立政府，恢復政制程序和舉行選舉外，需要提出與政變政權相對立的其他綱領。

我們提出了一個與8月政權針鋒相對的綱領，即推翻它，建立一個人民的民主的政府。這一政府有能力收回民族主權，重新建立起人民的充分的民主權利，促進工人團結和工會民主，實行土地改革和國家工業化以達到經濟獨立，把公用事業國有化，取消種族歧視，清洗並重建武裝力量，并把武裝力量變成人民和

国家用以保障民族主权和完整以及保卫人民的权利和成就的工具，执行以馬蒂(的主張)为基础的独立外交政策，即保卫和平和与一切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也就是說(我們提出了)以一个代表人民的、有能力进行必要的經濟、社会和政治改造以便民主地解决古巴的危机以及国家、人民面临的基本問題的这样的政府去代替暴政政府的綱領。

这个从一开始反对3月10日政变建立起来的政权，以“民主解决古巴危机”为名所坚持和宣傳的綱領性主張，从1957年开始，由全国委员会起草的綱領草案加以发展和完善了。

在不放棄爭取局部及目前要求的行动和宣傳的情况下，我們一直坚持着不間断的斗争，不間断的宣傳以爭取那些我們认为是一些根本的綱領性要求，或者象我們所称之为古巴危机的彻底的解决。

今天我們可以更好地評價这些主張的重要性。

这些主張是对全国觉悟的一个有效的貢獻，也促使它快速成熟和扩大。这种觉悟就是：推翻巴蒂斯塔暴政不可能局限于更換几个人，古巴的现实需要政权的改变，需要制度和机构的深刻的改变，要求这种改变不只是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改变，而主要是在經濟和社会方面的改变；反对巴蒂斯塔政府的斗争是和反对半殖民地結構和反对培植与支持着这一政府的帝国主义統治的斗争分不开的。

在反对由政变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斗争中我們所坚持不懈进行的爭取彻底解決問題的宣傳，並沒有使我們忘記也沒有削弱爭取当前要求和局部目标的斗争，也沒有离开爭取團結人民的一切力量和團結一切主張进步反对暴政分子的努力。

当前的要求是動員最广泛的群众爭取具体目标的杠杆。只要提出这些要求，就明显地看到达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因此，

这些要求就能动员国内最广泛的阶层，使其关心斗争。每一次动员都打击了政权。每一个小的胜利都鼓舞了人民的力量。同时，如果这些力量仅仅看到了目前的要求，如果仅仅看到了在一定斗争时期可能争取到的东西，如果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个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广泛纲领的话，那么他们早就很容易地变成了那些企图把斗争局限在恢复政制程序和纯粹政治变化的人们的牺牲品了。那我们当时就会因此而加强了反对团结的政治领袖们的群众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为了推翻暴政，美国政府是一个主要因素，无论如何应该维护它的好感，他们以同样的理由，把反共做为他们宣传的日常题目，就会加强了在古巴的危机中扮演帝国主义欺騙把戏角色的政治领袖们的群众影响，相反地，他们以诸如地理宿命論、古巴經濟出口特点及其他一些借口，宣傳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思想。

对待目前要求和彻底解决的正确态度和恰当地闡明它們之間的适当关系，是挫敗把反暴政斗争局限在纯粹政治变化的企图、消除亲帝分子和那些希望继暴政之后的新政府还同独裁政府一样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人们的影响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轉入地下及在非法和 恐怖条件下的斗争

从1953年7月26日起，暴政統治把我們党打入最殘酷最彻底的非法状态。

轉入地下，对我党組織的坚定性、在合法条件和非法条件下进行革命斗争的能力方面是一个新的考驗。

在地下诞生和发展比在經過长时期的合法生活和合法活动之后再轉入組織地下生活要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党员和党的領

袖已被大家普遍認識，并且已經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公开活动。

虽然如此，尽管7月26日这一天我們在哈瓦那和国内另外一些地方，还不知道圣地亚哥这一天发生的事件的性质和真正规模，而政府的鎮压力量突然向我們进攻，我們組織了从合法到非法的轉移，沒有遭受重大損失。

独裁統治和帝国主义利用了襲击蒙卡达兵營所造成的局势企图給党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其瘫痪并破坏党的組織。

但是党对这样的意外事件早就有了准备。

我們早就預先逐漸把許多同志从公开活动中撤回来，早已安排了房屋和工作机关，积蓄了物資以便繼續进行宣傳鼓动和党的組織工作。

尽管在7月26日那天對我們发动了快速和同时的进攻，只有两位全国领导人被捕，其他同志逃脫了血腥的迫害。两个多星期以后他們还繼續到那些警察知道的或在我們黨員的选民登記上有地址的同志們的家里或寓所里去搜尋、檢查。

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秩序地轉入地下，沒有間断地繼續进行革命工作。

暴政統治封閉了“今日报”，搗毀并搶劫了印刷所，还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不让任何一家印刷厂出版任何一份党的（或党領導的）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纸或任何材料。

第二个星期就出版了“每周通訊”，尽管它遭到过打击：首先，是偶然有一次发现了它的印刷所并監禁、拷打印刷报纸的一些同志；其次，报纸的主要发行点有一次受到告发和被占領，但是它在整个暴政时期都沒有停刊过一次。

地下时期的“梅利亚”杂志集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他的干部們的行动、勇气以及組織的一个标志。

我們不仅出版“每周通訊”和“梅利亚杂志”，另外一些地下刊物如“答案”、“通信”、“基础”，在山区开始武装斗争以后出版的、用来报导起义軍的作战情况的“消息报导”，都是我們出版的。

如果說出版这些刊物的工作和印刷无数的宣言是危險和复杂的話，那么組織运送、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及流傳就更加困难和危險了。

在每个省、在許多市都出版地方报纸，印刷宣言，复印中央领导机构寄給他們的宣傳鼓动材料，以便經常打击敌人，揭露敌人的暴行，以便告訴并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以便促进革命热情和革命活动。

党的所有組織当时都不得不重新調整，以便在非法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活动。

由于我們党在合法时期的发展中就已經找到这样的方式，即在民主集中制和其他列宁主义組織原則的基础上，骨干黨員具有严格的組織，党組織在执行按黨員比例的选举法时，就已具备了在非法状况下工作的能力。在中級組織方面仅做了一些小的必要的改变，以便能够在为了維持正常接触而产生的巨大困难中领导整个組織。

黨員和团員在非法情况下进行的工作需要很大的勇气、在原則上的坚定性、机警和灵敏，因为所有被逮捕的人都受毒刑、遭到侮辱和虐待，不少的人被殘酷杀害。

经历这种生死关头的絕大多數人都很英勇，說明党以前對他們进行的教育和鍛炼是有效的。

讓我們回忆一下在“每周通訊”印刷所里的同志們和同印刷所有联系的同志們在被捕后的表現，以及发行站的人除一个人之外全部在一次襲击中被捕后的表現；被刑罰殘毀、野蛮地折磨

至死的奇基·埃尔南德斯、何塞·馬丽亚·佩雷斯、帕基托·罗薩萊斯、梅雷洛、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和塞貢迪諾·安內罗曾怎么样的表現；在流血的圣诞节期間在奧連特北部海岸被杀的同志、在拉斯維利亚斯、在馬坦薩斯、在哈瓦那、在整个島上和整个反暴政时期被杀害的同志是有怎么样的表現；其余的黨員看到同志們倒下去了是如何繼續坚守崗位，担負起倒下去的同志們的工作，并爭取新的黨員繼續斗争。

无疑，恐怖在某些地方限制和削弱了党的組織，但是沒有能够摧毀我們、癱瘓我們，一点也沒有使我們离开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我們的綱領和政治路綫。

尽管有恐怖、追踪、暗杀和酷刑，我們党坚持自己的路綫、綱領和原則。

尽管在完全非法和恐怖的情况里，我們一直利用那怕是最小的各种机会的合法手段。当政府組織了一个委员会来听取关于举行选举的建議时，党写了一份很长的材料，其中說明現政权的性质、經濟危机的深刻的根源和目前的原因，以及为了解决危机实际上應該做些什么。我們用同样的方法把我們的意見傳達到合法的組織，如“共和国之友协会”、資產階級政党、議會等等。任何一个能取得合法生存的組織或委员会，那怕它們可能性非常小，都被我們用来傳播或实现我們的路綫。

这样，党与群众的联系从未断过。党一直到群众中去；群众一直到党内来。

我們对妥协磋商的态度

1957年以前大大增长的反对一切妥协阴謀的斗争是整个反暴政斗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如果妥协得逞的话，就会成为反暴政人民斗争发展的一个大障碍，也必定会延缓革命的进程。

达成妥协的危险是实际存在的，因为政变集团的一部分由于了解到一个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背离我国的政权的脆弱性，想与反对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取得协议；另一方面，这些党派领袖的大部分正是认为问题的解决在于恢复政制程序，所以他们同意达成一项成全政府搞选举的愿望的协议。

因此，我们揭露了由所谓“古巴新闻协会”首先倡议的、而后是“共和国之友协会”、CADI、“议会联席委员会”及各种保守“人士”所倡议的妥协的全部企图。

妥协的各种磋商谋求——背着人民，反对人民，并排斥所有的左倾和反帝的党派和人士——在巴蒂斯塔暴虐政府和资产阶级在野党右翼领袖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其基础是这些资产阶级领袖接受既成事实，并同意尊重巴蒂斯塔自己规定的执政终期，这一切的代价是巴蒂斯塔恢复“和平轮流”执政。

我们党不倦地揭露这些反动的、反民族的、反工人的主张。对所谓“古巴新闻协会”的每一次磋商，对“共和国之友协会”与政府的每一次会见，对CADI密使的每一次走动，对“议会联席委员会”会议上的每一个主张，“每周通讯”都公开地揭露它们的目的和阴谋，以引起人民警惕，迫使那些谈判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群众对妥协的积极反对。

暴政为了达到妥协目的、当作可能的措施而加以鼓吹的建议之一，是举行一些制宪（会议）选举，以修改1940年的宪法。

这个建议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既不触动政变政权又当然地能够让它无问题地执政的选举来同全国开玩笑。

第二个目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对1940年宪法作一个反动、亲

帝的修改。

我們全力地与这个建議做斗争，并公开地揭露它的目的。

遭受政变和整个半殖民地制度破坏、践踏、噬伤的 1940 年的宪法是一面为全体人民力量高举着的反暴政的旗帜。

針对着公职人員必須进行的法律宣誓，哈瓦那的大学生发动了一个广泛的保卫和維護宪法的宣誓运动。

成千上万的公民在这个宣誓上签了名。

我們在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修改宪法的企图做斗争的同时——修改之一是取消帝国主义公司有义务采用和培养古巴技术人員的規定——宣布，在这样情况下的一种修改只能够使宪法更坏，只能够夺走宪法中最有力和最进步的部分。同时，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民可以有修改宪法的需要，以使宪法更有力、更适合于滿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

打破召开一次制宪會議的妥协阴谋是反暴政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反对妥协斗争中有特別重要性的是对 1956 年在资产阶级反对党同意和参加下举行的局部选举的群众性的巨大的反对。这个企图被粉碎了，它有助于維持并扩大对暴政的孤立，阻止了它搞选举阴谋，要不然又会給暴政統治一个政治上的依托。

面对着举行制宪选举或局部选举的企图，我們坚持提出立即举行普遍选举的要求，給人民以表示自己选举意志的保障和条件，以利于民主地解决古巴危机。这一口号在揭露敌人玩弄妥协花招和团结群众反对統治者的計劃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在反对妥协的斗争中，我們沒有拒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通过談判的政治解决。我們讲明必须具备的必要条件，應該提出和达到的要求，以便任何一項協議都不会成为一个騙局或一場嘲弄，而是成为問題真正的解决。但是暴政既不能接受这